

有员工单日上厕所累计超6小时被认定旷工；有员工因腹痛如厕3分钟丢了工作——

“带薪如厕”被解雇，如何界定合理需求与违纪脱岗？

本报记者 肖婕好

“第一次收到邮件时觉得难以置信。”1月26日，曾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女士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她曾因上厕所离开岗位20分钟，被公司发邮件要求解释这段时间的去向。“我们这层楼只有一个公用厕所，有时要排队，也可能去其他楼层，20分钟我觉得也正常。”王女士不解，“我只是上个厕所，为什么需要向老板解释？老板是怀疑我‘摸鱼’吗？”

工作时间内上厕所本是人之常情，然而记者注意到，员工因如厕离岗被解雇的劳动争议案件时有发生，近期就有几个法院审理并宣判了此类案件。上班期间因如厕、短暂休息等原因离岗，能否成为公司解雇的理由？“合理生理需求”与“摸鱼”“违纪脱岗”的边界在哪里？

如厕时间长被解雇引纠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中，刘某在南通某电路公司担任专员，2023年2月期间，刘某频繁、长时间地停留在公司卫生间，日累计时长则一个多小时，长则超过6小时。公司认为该行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在与刘某面谈后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刘某离职后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20余万元，未获支持后又诉至法院。

法院根据监控视频查明，刘某在2023年2月期间长时间停留卫生间达11次，每次31分钟至3小时5分钟不等，单日最长停留6小时21分钟。

法院审理认为，正常如厕应立即去即回，短暂停留不构成擅离岗位，但刘某的行为明显超出合理生理需求范围，也超出其岗位职责所需，且刘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间在履行工作职责，故构成擅离岗位。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其累计旷工已达6天，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阅 读 提 示

近期有法院审理并宣判因如厕离岗被解雇的劳动争议案件。律师表示，界定“合理生理需求”与“违纪脱岗”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须严守合理合法边界，劳动者也应履行勤勉工作的义务。

合法。

同样是因如厕离岗被解雇，另一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却不同。

李某是北京一家食品公司的消防中控员，2022年11月值班期间因腹痛如厕3分钟，公司以“工作时间擅自离岗，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解雇。李某认为，自己的离岗行为并不违反公司纪律，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脱岗理由正当、时间短暂，属正常生理现象，且微信记录显示其曾多次联系同事顶岗，已经尽量避免脱岗行为发生，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万余元。

同为“如厕离岗”，为何判决结果迥异？

“关键不在于是否离岗，而在于离岗的合理性。”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全指出，刘某的行为呈现出“时间长、频率高、未履行请假程序”的特点，单日6小时、月累计11次超1小时的滞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体正常生理代谢所需的时间范畴，属于一种变相的“旷工”或怠工行为；而李某因突发腹痛短暂离岗3分钟，属基本生理需求，而非主观上的逃班行为。

如何界定合理需求与违纪脱岗

因如厕引发的争议并非个例。工作中，饮水、短暂休息等行为，也常陷入“是否属于摸鱼”的争议。工作中的“摸鱼”行为该如何界定？

“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摸鱼’这一明确概念。”北京福茂律师事务所主任时福茂说，

“正常生理休息与‘摸鱼’的核心区分在于主观意图和行为合理性。”

时福茂表示，从主观意图来看，正常生理休息是基于身体的客观需求，比如口渴饮水、疲惫小憩、生理排泄等，劳动者并无逃避工作的想法，且行为结束后会立即返岗投入工作；而“摸鱼”则是主观上不想工作，借喝水、起身活动等名义变相偷懒，核心目的是规避劳动义务。

“从行为特征来看，正常生理休息具有短暂性、即时性的特点，如喝水1~2分钟、起身活动3~5分钟，符合一般人认知。”时福茂说，“而‘摸鱼’多表现为持续性离岗、在岗不作为，或频繁借生理需求名义脱岗，时长远超合理范围。”

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季巧士进一步补充道，界定“合理生理需求”与“违纪脱岗”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离岗事由是否为满足正常生理需求、离岗时长是否在合理范畴、离岗行为是否对企业正常运营造成实质妨碍等。

“若时长短暂、偶发，事由紧迫真实，事后能合理解释，且未造成工作延误等实质性后果，通常满足‘合理生理需求’的特征；反之，若长时间、高频次离岗，未履行告知或请假程序，主观上以逃避工作为目的，则易被认定为违纪。”季巧士说。

岗位属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北京盈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清鑫表示，不同岗位的在岗要求存在显著差异，一些特殊岗位如救生员、消防中控员等，对在岗要求极高，短暂离岗可能引发严重安全隐患，因此需严格履行报备或交接程序；而一般的岗位，如果员工短时间离岗未对工作造成影响，则不应过度苛责。



1月23日，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总工会联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举办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交通安全培训班。交警为外卖员讲解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通过身边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外卖员时刻绷紧安全弦，摒弃交通陋习，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工 警 联 动 守 护 骑 手 平 安

本报通讯员 张广星 摄

云南法院持续加大打击拒执罪力度

本报讯（记者黄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召开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通报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果并发布5个典型案例。自2025年2月行动开展以来，云南已构建起“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法院主办、公安检察协同”的一体化工作格局，形成打击拒执犯罪的强大合力。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云南法院累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执犯罪线索1063条，公安机关立案侦查422件，法院一审审结并以拒执罪判处罪犯116人。专项行动有效撬动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163件案件的被执行人实现从“要我履行”到“我要履行”的转变，通过主动清偿债务或达成和解，累计执行到位金额达9464.21万元。

云南法院打造司法智慧“工具箱”，通过强化证据意识破解移送难题，借助大数据查控系统刺破财产隐匿“隐身衣”，并以梯次惩戒体系兼顾执行力度与温度。发布会公布的5个典型案例，涵盖恶意转移财产、利用他人账户隐匿资金、拒不迁出房屋、案外人协助规避执行等多种类型，彰显法院对新型规避执行行为的精准识别能力，以及对公然挑衅司法权威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据悉，云南高院将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出台办理拒执刑事案件工作指引，推动部门协作从“个案协调”升级为“机制保障”，实现办案标准统一、衔接顺畅。下一步，云南法院将持续深化协同机制、提升打击质效、激活自诉程序、强化宣传引导，以常态化举措捍卫法律尊严，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AI提供信息有误，用户诉平台侵权

判决明确，AI“承诺”不构成平台意思表示，但平台须以醒目方式提示风险

本报记者 邹偶然

AI生成错误信息后竟“建议”用户起诉自己，这般情节竟真的走上法庭。针对国内首例因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幻觉”引发的侵权案，浙江杭州互联网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判决，明确AI的“承诺”不构成平台意思表示，并系统阐释了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边界——平台虽无法保证“零幻觉”，但须以醒目方式提示风险、采取合理技术防错。

2025年6月，梁某使用某AI应用程序查询高校报考信息，结果AI提供了某高校的不准确信息。在梁某指出错误后，AI的回应是“如果生成内容有误，我将赔偿您10万元，您可前往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直到梁某向AI提供该高校的官方招生信息，AI才承认自己生成了不准确的信息。梁某遂提起诉讼，认

为AI生成不准确信息对其构成误导，使其遭受侵害，要求这款AI的运营者赔偿9999元。

梁某认为，AI生成的不准确信息对其构成误导，增加了信息核实与维权成本，平台理应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则称，对话内容完全由模型生成，不构成意思表示，自己已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无过错，且梁某并未产生实际损失，因而亦不构成侵权。

法院审查后认定被告已完成大模型备案与安全评估，并在应用界面、用户协议等多个层面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原告未能证明其遭受了实际损害或存在相当因果关系（AI不准确信息未实质影响其决策）。最终，法院认定平台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一审驳回了原告梁某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判决明确指出，现行法律下，人工智能并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既不能独立作出意思

表示，也不能被视为平台的“代理人”或“传声筒”。换言之，即便AI在对话中作出了承诺式回应，也不能理解为平台真实意愿的外化。该案中，尽管AI在对话中生成了“赔偿承诺”，也不足以让平台因此受到合同或承诺的约束。

对于这起AI“幻觉”侵权案，杭州互联网法院指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应当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创新与权益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为技术创新保留必要空间，避免因责任过度前置而抑制新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必须守住法律底线，严格禁止生成各类有毒、有害、违法信息，防止技术风险向现实社会外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负有严格结果性审查义务，一旦生成此类信息本身即构成违法。而对于一般性不准确信息，现行法律并未要求服务提供者确保“零错误”或信息绝对准确，强调其应采取合理措施

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法院还指出，平台须采取必要、合理的醒目措施，让用户认知AI的局限性。并采用同行业通行技术措施提升准确性，达到市场平均水平。对于涉及生命安全、心理健康等高风险特定领域，提供者负有更高义务，包括采取特别技术措施与特殊安全保障。

法院特别提醒社会公众，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高度流畅、自然的语言应答时，应保持必要的警觉与理性认知。当前技术条件下，大模型本质上仍是生活和工作中的“文本辅助生成器”和“信息查询工具”，尚不足以充当可靠的“知识权威”，更不能作为替代个人判断的“决策者”。对AI生成内容的轻信与盲从，本身就可能放大“幻觉”带来的风险。只有在理性使用的前提下，AI的“魔法”才能真正成为增强个人能力的工具，而不是制造误导甚至风险的来源。

醉驾犯罪案件数持续下降但仍然高发

检察机关提醒，无论因何情形酒驾醉驾，都将面临法律后果

本报讯（记者卢越）1月26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3年底，“两高两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来，醉驾犯罪案件数持续下降，同时，醉驾犯罪依然高发，醉驾治理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多措并举、久久为功。

2025年1~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危险驾驶案件23.6万人，同比下降22.1%；提起公诉21.1万人，同比下降17.2%，危险驾驶案件连续两年较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危险驾驶罪仍是检察机关受理最多的犯罪，占受理所有刑事案件人数的14.4%。

据介绍，一些群众对醉驾危害后果缺乏准确认识，重大恶性事故仍然偶有发生。有的群众高估自己酒后驾驶控制能力，认为“酒驾是小事”“不被查就没事”。事实上，醉酒驾驶不仅可能触犯危险驾驶罪，且行为恶劣、后果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更重的罪名，面临更重刑罚。如检察机关办理的杜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杜某某夜间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多次蹭倒、撞击过往车辆和行人，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批准逮捕，并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有的群众对醉驾新规理解不到位，因心存侥幸而触犯法律、情节加重。有的错误地认为酒后短距离挪车、交接车辆不构成犯罪，但忽略了如果存在造成事故等从重情节构成犯罪的犯罪。即使没有从重情节，一旦被查处也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罚款等行政处罚。有的醉酒驾驶血液酒精含量相对较低，但被查处时选择逃避、阻碍检查或者找人顶包、购买执法人员，因有从重情节而入罪，行为严重的还可构成妨害公务或者袭警等犯罪。有的有酒驾醉驾前科劣迹，仍然继续醉驾，不但构成犯罪，且将被从严判处、加重处罚。

检察机关提醒，无论因何情形酒驾醉驾，都将面临一定的法律后果，轻则罚款、拘留、吊销驾照，重则入罪、判刑，甚至面临严厉重罚。要认真学习醉驾新规，自觉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共同营造拒绝酒驾醉驾的社会氛围。

江苏省淮安市

多元解纷联动机制破解欠薪核算难题

本报讯（记者黄洪涛 通讯员高蒙蒙 李星）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依托“治理欠薪”多元解纷联动机制及时介入指导调解，采用“人工费与生产产值比率倒推法”，成功破解一起欠薪案件中工资数额认定难题，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75.6万元。

2021年8月，甲建筑公司总承包某小区建设工程，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乙建设公司。2023年4月，乙建设公司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杜某。杜某随后组织徐某等15名农民工进场施工，工程结束后拖欠徐某等人工工资共计75.6万元。2025年11月，徐某等人向淮南市淮安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淮安区人社局组织调解期间，甲建筑公司、乙建设公司虽认可涉案项目尚拖欠杜某相关工程款项98万元，但称徐某等人的工资已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代发完毕。调解陷入僵局。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依托“根治欠薪”联动工作机制及时介入，联合住建部门专业人员，按照建设工程领域人工成本与生产产值的占比比例，根据杜某承包工程的工程价值总额（即生产产值），测算出该工程应付出的人工成本。该成本高于已代发的徐某等人的工资，两者差额与徐某等人的诉求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各方经再次协商顺利达成调解协议，明确由甲建筑公司承担欠薪支付义务及具体支付期限。

为预防履行风险，法院主动引导各方当事人就上述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因甲建筑公司未按约定支付欠薪，法院立即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依据住建部门提供的监管信息，依法扣划甲建筑公司预先缴存、已到期应退还的工程质量保证金75.6万元，专项用于支付徐某等15名农民工的拖欠工资。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联合区人社局、住建局、总工会等部门单位共同建立治理欠薪工作站，制定出台《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纠纷“分调裁审”一体化联动工作机制》，开辟“快调、快立、快审、快结、快执”维权绿色通道，截至目前，累计为6500余名农民工及时足额追发欠薪9800余万元。

吉林省

法院多措并举解决执行难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1月26日，记者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2025年，该院在全面开展交叉执行工作的同时，坚持做实“前端治理”、推进“终本清仓”，探索“执破衔接”，执行工作质效持续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一年来，吉林法院受理执行案件14.76万件，执结14.55万件，执结率98.6%，连续3年全国排名第一。

据介绍，吉林省高院执行局聚焦“关联性强、信访集中、长期未结”三类重点案件，通过系统筛查、基层上报、信访倒查等方式初筛，创新实施“三类清单”分类管理，同步建立承接反馈与进度跟踪机制，形成“指令—承接—推进—反馈”全链条闭环，确保交叉执行高效协同、落地见效。

在全面开展交叉执行工作的同时，吉林法院还坚持把“抓前端、治未病”落到实处，由内及外多措并举推动执源治理，加大财产保全力度，健全完善执前调解工作机制，坚持调解成功与履行到位一体推进，构建判后督促履行制度，切实解决“只管判不管执”问题。

在推进“终本清仓”过程中，吉林法院严格管理全省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件，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于办理有财产案件。在探索“执破衔接”过程中，吉林法院在化解执行积案的同时，更加强调市场主体的甄别退出与市场要素的再流动。对于确无救治可能的企业，依法高效进行破产清算，及时出清大批“僵尸企业”；对于一些有潜力、有前景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等方式帮助企业化解危机，尤其是在处理关联案件与债权人众多、破解烂尾楼难题以及保障房屋买受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吉林执行实践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较为成型的经验。